

麓书院学术文库·中国哲学研究系列

编 朱汉民



○ 陈谷嘉 著

MINGDAI LIXUE LUNLI

SIXIANG YANJIU

湖南大学出版社

明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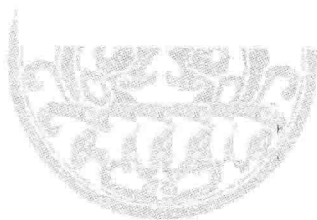
岳麓书院学术文库·中国哲学研究系列

主编 朱汉民

明代理学伦理 思想研究

MINGDAI LIXUE LUNLI
SIXIANG YANJIU

○ 陈谷嘉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分三编十章梳理了明代理学的演变过程。从明初朱元璋父子独尊程朱理学,到陈献章和湛若水引领理学向心学转变,再到明中叶王阳明心学的兴起、分化及衰落,直至晚明理学家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开启了明清之际的思想启蒙,明代理学体现了不断演变的时代特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陈谷嘉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5667 - 0803 - 8

I. ①明… II. ①陈… III. ①理学—研究—中国—时代
IV. ①B248.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8565 号

明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

MINGDAI LIXUE LUNLI SIXIANG YANJIU

作 者: 陈谷嘉 著

责任编辑: 祝世英 王和君 责任印制: 陈 燕

印 装: 长沙鸿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32 开 印张: 12.75 字数: 343 千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7 - 0803 - 8/B · 100

定 价: 45.00 元

出 版 人: 雷 鸣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410082

电 话: 0731-88822559(发行部), 88821335(编辑室), 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 0731-88649312(发行部), 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 presswanghj@hnu.deu.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 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次

绪论	1
第一章 明代理学伦理思想概论	8
一、明代以理学开国，程朱理学的政治化	9
二、心学的酝酿和心学先驱	12
三、阳明心学的崛起及其分化	19
四、王学的困境及对近代社会的转型	29

第一编 明代朱学的统治及其僵化

概论	45
第二章 朱元璋与明初理学	47
一、由结识儒士到亲近儒学的朱元璋	49
（一）结识儒生	49
（二）亲近儒学	52
二、确立朱学统治地位的朱元璋	55
（一）排除“杂书”，“勒成一经”	56
（二）三部理学《大全》的编纂	59
（三）朱学统治的危机	63
第三章 宋濂的理学伦理思想	69
一、宋濂生平与学术渊源	69
（一）宋濂生平述略	69

(二) 学术与师承关系	72
二、“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	76
(一) 《七儒解》——儒分为七	77
(二) “古之人以道德为师者，有孔子是也，有孟氏焉”	79
(三) 儒、佛“虽设教不同，其使人趋于善道，则一 而已”	83
三、“天人合一”的道德缘起论	87
(一) “天地未判，道在天地”	88
(二) “吾心，亦一太极也”	91
四、“存心养性”的道德修养论	97
(一) “人伪之滋，非学不足克之也”	98
(二) “人生而静，静本圆明”	101
第四章 刘基的理学伦理思想	109
一、道德缘起于“天”	111
(一) “天者，众物之共父也”	111
(二) “人也者，天地之分体”	114
二、“天道好善而恶恶”的人性论思想	118
(一) 关于“奸宄多而仁义少”的探源	118
(二) “性迁于习”	122
三、“心敬则存”的道德修养论	125
(一) “敬也者，其万事之根本与”	125
(二) “驱之以利剑，而不为不义屈”	129
四、“化不善之为善”的道德教化论	135
(一) “人之所以参天地者，三皇为之也”	135
(二) “夫学也者，学为圣人之道也”	139

第二编 王学的兴起及其分化

概 论	147
第五章 陈献章与湛若水的伦理思想	149
一、陈献章的理学伦理思想	149
(一) 人伦道德缘起于心的道德本体论	151
(二) “主静”的道德修养论	156
二、湛若水的理学伦理思想	164
(一) 从哲学本体推演出道德本体的心	166
(二) “随处体认天理”的道德修养论	174
第六章 王阳明的理学伦理思想	182
一、心与物	189
(一) 王阳明“心物关系”的溯源	189
(二) 王阳明“心物关系”的特征	192
二、心与理	196
(一) 朱熹的“心与理”	196
(二) 陆象山的“心即理”	197
(三) 王阳明“心即理”思想的特征	197
三、良知	199
(一) 王阳明“良知”说的内涵	199
(二) 王阳明“良知”说的特征	204
四、致良知	206
(一) 什么是“致良知”	207
(二) 如何致良知	210
五、四句教	216
(一) “四句教”之由来	216
(二) “四句教”之内涵	218
六、王学的分化及其衰败	221
(一) “四句教”与王学分化	221

(二) 王学内部禅化与反禅化的两种倾向	224
第七章 刘宗周的理学伦理思想	232
一、气本体的人伦道德缘起论	234
(一) “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	234
(二) 人伦道德本于“天”	237
二、性本善的一元人性论思想	242
(一) “气即性”的人性论思想	243
(二) “已是千古定案”的善本论	245
三、“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论	257
(一) “人生而有习”	257
(二) “格物致知，所以明也”	262
(三) “说一尺，不如行一寸”	265
(四) “学问吃紧工夫，全在慎独”	269

第三编 明代理学的困境及其

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概 论	277
第八章 黄宗羲的理学伦理思想	278
一、“盈天地皆心也”的心学	279
(一) “盈天地皆心也”的哲学意义	279
(二) “盈天地皆心也”的伦理意义	288
二、性本善的一元人性论思想	297
(一)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未有不好善者”	297
(二) 人性论与“四句教”	303
三、“以善为宗”的道德修养论	310
(一) “吃紧在去人欲而存天理”	310
(二) “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	316
四、黄宗羲思想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启蒙元素	322
(一) “古者天下为主，君为客”	322

(二) “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	327
第九章 王夫之的理学伦理思想	334
一、道德本体说	335
(一) “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的气本论	336
(二) “人相与为伦而道立焉”的道德缘起论	339
二、“善，人之独也”的人性论思想	344
(一) “性其总，合两也”	344
(二) “善者，人之独也”	350
三、“人之独而禽兽不得与”的道德修养论	359
(一) “习者人道”	359
(二) “《中庸》言慎独，为存养之君子言也”	364
第十章 顾炎武的理学伦理思想	374
一、人伦道德缘起论	376
(一) “非器则道无所寓”	376
(二) “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	379
二、“行止有耻”的道德修养	381
(一) “贵廉洁，贱贪污”	382
(二) “夫仁与义，未有不学问而能明者也”	385
三、性善论与教化论	389
(一) “诚者，天之道也，岂非善乎”	390
(二) “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	393
后 记	398

绪 论

明代是理学发展的重要阶段。黄宗羲说：“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明儒学案·发凡》，第14页）明代在文章事功方面，确不及前代，对理学的概念系统和理论系统，如其“牛毛茧丝”，几乎无不论及，可谓“舌底澜翻，自谓探幽决微”，明代理学的发展进入到完备和成熟时期，理学亦由此走上衰落及其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发展时期。

宋明理学作为儒学主流文化思想的形态，支配中国社会达数百年，历经宋、元、明、清四代，学者们把此思想文化形态称为宋明理学，这是对新儒学即理学的时代特征的概括，表明理学经历了创建、发展和演变的漫长过程，表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儒学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无论是对中国儒学理论构成的形态而言，或是对社会和我们民族心理上的影响等等，都是以往所不及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如同不了解先秦儒学便不了解中国儒学精神一样，不了解宋明理学也不可能了解中国儒学的发展，不可能了解以人伦为本位的儒学精神。

宋明理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显示了一个突出特点，它始终紧跟时代的前进步伐，紧扣着时代的脉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演进，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理论形态和表现形式，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在六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它显示出发展的阶段性，表

现出所经历历史阶段的理论品性。

首先，建构时期宋代理学的理论品格可用一个“新”字概括，“新”表明中国古代儒学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走上了新儒学即理学的发展阶段。众所周知，西汉儒学被汉武帝确立为国家统治思想以后，先秦儒学逐渐失去了人学的学理性品格而成为单纯的政治工具性儒学，儒学由此自我封闭而走上僵化。儒虽能治国，但不能治心，在玄学和佛学的冲击下，儒学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既无先秦时期学术之“显”，又无汉代政治之“威”，汉唐时期流传的是传注儒学，儒学的人文基本精神被阉割。随着五代十国纷争的结束，宋代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时代期待着儒学理论上新的编制，期待着应对佛道挑战而具有权威性的新儒学的出现。正是在时代的催生下，汉唐传注儒学走上了变革的道路。为了建构具有权威性的新儒学，理学家们对八百余年的汉唐传注儒学进行全面的审视和检讨，为了进行儒学新的理论编制，几乎一致回到先秦时代，对原来儒学文本进行重新阐发，在理论上突出了儒学的心性之学的中心，特别对《四书》给予了高度关注，其重要性盖过了儒家经典《五经》。理学家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一是以儒学的义理的阐发代替了汉唐的儒学传注，学风为之一变。更为重要的是凸显了儒学是人学的本色，实现了儒学人伦道德精神的回归，儒学从内容上和形式上为之一变，凸显了一个“新”字，故称理学为新儒学。以上是宋代理学建构时期所表现的特色，也是理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性的特征。

其次，理学在元代从精英的书斋理学走向社会和民间而为全社会所认同的理念价值，这是元代理学发展的特点，也是理学由创立而走上通俗化和普及化的阶段性重要标志。检视历史，一种理论思维是否顺应历史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接受历史的考验。如果说宋代尚是理学建构时期，还来不及对它进行检验，那么元帝国建立后情形则不一样了。它结束了宋代南北对峙的局面，国

家和民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各民族的融合和地域的统一，期待着一种文化思想的整合，需要一种统一的思想指导建立中华民族的共同的精神家园。历史选择了理学，也就是说，历史和时代期待元代传承宋代建构的新儒学，为了因应新的时代的需要，也使书斋中的理学变成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核心理念，需要对理学进行一种特殊的加工和制作，这就是对理学的理论系统和概念系统进行通俗化的解读，并普及到全国各地域和各民族。正是在此历史发展的驱动下，理学进入到了元代通俗化和普及化的发展时期。

元代理学的通俗化，首先表现在对儒家经典文本义理上的通俗化的解读。元代与宋代不一样，理学家专注于在宋代被提升的儒家经典《四书》文本的通俗化的解读，《四书》文本的通俗易懂程度前所未有，与当今流行的白话读本相比也毫不逊色，这种通俗化的工作大大地推动了元代理学伦理的普及。

另外，还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元代理学伦理打破了理学伦理专于理论的宣示以及拘囿于理论上的说教，而是采取了大众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形式，这主要是通过讲故事和以戏曲表演的形式进行道德教化。如为了普及儒家的孝文化，元代把在民间流传千载的孝子故事进行挖掘和整理，选择具有典型意义而且对各个阶层具有代表意义的孝行故事，辑成《二十四孝》，辅以图像和诗歌，在社会广泛地普及儒家的孝文化。另外，又通过戏曲的形式，对大众进行人伦道德的教化。如脍炙人口扬善抑恶的《赵氏孤儿》、褒扬诚信道德的《晋陶母剪发待宾》，以及挾伐贪财嗜利的《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等元曲，就是元代著名的元曲伦理剧。总之，元代理学伦理思想在全社会得到广泛的传播，其普及达到了全民的程度，目不识丁者，也从孝行故事和戏曲表演中得到了深刻的人伦道德教育，理学伦理思想受到了社会的全面检验，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均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所罕见。元代虽然在理学的理论上并无新的创造，但把儒家伦理普及到全

社会和各个民族，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贡献，这从儒家文化成为我们古代社会认同的理念价值所作的贡献而言，无论作如何的肯定都不为过。因此说，元代理学是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显示了元代理学发展的特色。

历史发展到明代，理学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明代社会进入到中国封建社会的下行阶段，中国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不断被激化，随之理学进入了明代的演变时期。如果宋代理学体现了一个“新”字，是儒学的革新，是新儒学，如果说元代理学表现出通俗化和普及化的时代特点，那么明代理学所体现的是一个“变”字，不断演变则是明代理学发展的时代特征。

明代理学的演变开始于明代立国时期。朱元璋父子为了巩固其统治，开启了以理学治国的布局。为了强化理学统治，朱元璋和朱棣父子，类似于西汉时期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排斥理学百家，“勒成一经”，实现“家孔孟而户程朱”，编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把程朱理学推上独尊的地位，程朱理学由此演变为“国宪”和政治权威原理。程朱理学的官学化和神化，是宋代理学至明初理学发展的一大特色，也是明初理学之“变”所呈现的时代特征之一。

到明代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在“变”的主导下，明代理学又进入到另一个发展时期，这就是由理学家陈献章和湛若水开启的由程朱理学向心学转变的时期，陈、湛由此成为明代心学转变的先驱者。如果说宋代理学是重新建构儒学的权威，重新发挥儒学外用治国和内用治心的双重功能作用，那么明中叶，由“变”主导的理学则是要打破程朱理学的绝对统治的权威。被神圣化的朱学统治，是对人们思想的严重桎梏，朱熹倡行的“理”本论，把“理”奉为宇宙的主宰，人必须服从“理”的安排和支配。“理”又是人伦本体，具有哲学和伦理双重意义，人受外在“理”的支配，也就是受外在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支配，人的道德自律精神受到窒息。没有主体精神和道德自律精神的作用，朱熹的“格

物致知”包括读书、遵守礼仪规范等等，只能是给道德主体套上种种精神枷锁，所谓成圣成贤只能成为少数精英才可能拥有的奢侈品。历史表明，要激活理学人伦道德精神，必须打破朱学的统治，必须改变朱学自我封闭的状态。正是有基于此，所以由陈、湛发出的向心学转变的先声，至明中叶很快演变为明代理学的主流，心学得以兴起。王阳明心学的崛起，是对程朱理学统治的颠覆，标志着明代理学进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儒学再一次走出了被神化的怪圈。

王学的兴起，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朱学的绝对统治，挺立了主体精神，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和思想空间，为明初被僵化了的理学注入了一定生机与活力，但心学的崛起毕竟是宋明理学内部程朱理学与陆象山心学地位的调整与变化，也就是被长期旁落和受冷遇的陆象山心学受到空前的关注。王阳明心学从思想渊源来说与陆象山心学同为一脉，之所以陆王并称为陆王心学，究其原因即在此。虽然明代理学从明初至明中叶，始终在演变之中，但中国近代社会文明的发展，也如中国古代前文明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是氏族血缘关系未解体的维新即改良的特殊道路一样，中国近代文明的发展也走的是一条保守和改良的道路，“死的抱着活的”，新旧纠葛，中国封建的解体极其缓慢，中国近代文明发展难产。正是在此历史情形下，明代思想文化变化的烈度始终受到时代的限制。虽有宋濂思想“三变”，心学大师王阳明思想亦有“三变”，赓即有王门后学钱德洪和刘宗周思想“三变”，但其变却走不出中世纪的时空，其变并未带来明代理学质的变化，所带来的只是理学内部理学与心学地位的调整与变化。明代心学虽在理论上改变了其表现形式，但终因不能因应明代资本主义生长和发展的需求，历史注定它必然要走上衰落的命运，心学发展的困境和分化是不可避免的。

至晚明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和发展，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与冲击，明代社会空前震荡，进入到一个“天崩地解”的时

代，晚明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社会的大变动，加剧了明代思想文化变化的烈度，在社会的剧烈震荡下，“变”把中国古代社会带到了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一批有见识的理学家如黄宗羲、王夫之和顾炎武应时而起。他们一方面对在心性精神圈内空转的王学末流进行了清算，揭露其危害，另一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和检讨中找到了向近代社会转型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开启了明清之际的思想启蒙。在时代的驱使下，黄宗羲思想经历“三变”而最终赋有近代启蒙思想的元素，以此言之，“变”不仅贯穿于明代理学发展的始终，而且“变”还把理学引向了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道路。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变”字可概括明代理学发展的特征。

黄宗羲、王夫之和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三大启蒙思想家，他们各自对中国近代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黄宗羲的重要贡献是，他从远古中国前文明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特殊路径中，从未解体的氏族血缘关系所保持的血亲之爱引发的古代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取代了“君为主，天下为客”，把封建社会的臣民绝对服从君主统治，颠倒为民为主而君为客，“客从主便”，臣民变成了国家主人，君主应服从民众的意志而不是相反，从民绝对服从君主的臣民意识转化为具有近代社会的人民拥有自然权力和自由的公民意识，宣扬了近代的人民民主自由的政治和道德价值观，使人耳目一新。王夫之是一个卓越的哲学家，他把哲学的变革作为近代政治变革的先导，以自然哲学观察和考察社会现象，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人性论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发前人所未发的观点，特别是在人伦道德缘起问题上，既打破了神启论，也打破了与人俱生的道德先验论。他提出人伦道德的缘起既有主观条件也有客观的社会条件，前者是指人摆脱了动物的直接性和本能性，人由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变成有语言和有思维的真正的人；后者则指人类组成生活的社会共同体，在此共同体中产生了人际交往和联系，并由此形成人与人间

相互联系的社会关系和道德关系，人伦道德即是在上述主客观条件下缘起的。王夫之虽未提出社会存在的概念，但他认为人伦道德是在人类社会关系和道德关系出现的条件下而缘起的，这实际上已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猜测出人伦道德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无疑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突破，对近代社会变革具有指导意义。顾炎武既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指出“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之谓物”，与王夫之一样，他把社会的实在性看成人伦道德缘起的基础。如果说王夫之从哲学上清算了王学末流谈空说禅的祸害，那么顾炎武则从历史的实证论述历史兴亡的教训，揭示历史上奸贪和善善恶恶的产生条件和危害。不懂历史的人，没有未来，历史是通往未来的历史，历史是过去的再现。顾炎武认为要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从以往的历史的惨痛中吸取教训，他说：“礼仪，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顾炎武虽然没有像伦理教科书一样的宣示和说教，但他在历史实证基础上所作的《贵廉》和《廉耻》，以实学取代空疏学风，给将要陆沉的晚明社会带来了一缕具有近代社会文明的新鲜空气。如北宋时期史学曾引领着理学的兴起一样，顾炎武的史学也起到了引领向近代社会转型的作用。总之，明清之际三大启蒙思想家推动了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他们的思想对苦难中挣扎并向往未来新社会的人们具有极大的思想启蒙作用，使其从中得到向近代社会前进的思想启迪。

第一章 明代理学伦理思想概论

朱明王朝的建立，虽然仍是封建王朝一般性的政权轮换，并不影响其封建社会的性质，但它毕竟不是在历史原点上打圈子，它标志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发展已进入到一个重要阶段，这就是史家称谓明代社会已进入到封建社会的下行阶段。在这个阶段，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已激化，特别是封建社会具有超常稳定性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动（资本主义的孕育萌芽与发展冲击着封建经济结构）。正是这种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动带来了上层建筑政治文化一系列变化。思想文化的发展与变化，虽然具有时代的超前性，或者滞后性，但不管前者或后者，从总体上皆不可能背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否则，思想和文化失去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本根。纵观明代理学的发展，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和限制，所以与宋元时期相比较，显示出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虽然支配宋、元、明三代思想文化主流同是理学思潮，但理学前行的步骤是不一样的，其轨迹不断被时代所修正。这在明代表现得尤其突出。为了认清和把握明代理学伦理思想的时代特色，有必要对明代理学伦理思想发展过程作一个总体的概述。

一、明代以理学开国，程朱理学的政治化

明代立国者朱元璋，虽然是中国历史上开国皇帝中第一个无文化者（年少当和尚时念经认识了字），但他对思想文化在巩固和维护政权的重要作用方面，比起以往朝代的开国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朱元璋自知自己草根出身，根基薄，登上皇帝宝座后，唯恐打下江山难以保全，产生一种多疑心态，始终在政治上采取一种强势和高压姿态。他背叛了曾拥戴他的广大农民兄弟，心中所思所想，是如何强化自己的统治，如何排除异己。为了加强专制统治，他废除了中国历史上已历多世的宰相制度，并且在思想上采纳了近臣解缙的建议，效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在明代“罢黜杂书”，“勒成一经”，编纂明王朝思想一统的所谓经典著作。这就是由朱元璋策划、其子朱棣实施修纂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即所谓三部《大全》。从理论上编制明王朝的统治之道。

明王朝编制的“道”主要是儒家传统的人伦之道。朱棣在三部《大全》御制《序》说：“所谓道者，人伦日用之理。”也就是说，“道”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之道。这五伦之道是心性发端之“道”，即朱棣指出的“初非有待于外也之道”。朱元璋父子强调修纂三部《大全》是因“道不明不行之故也”，是指封建纲常失去了其权威性和神圣性，反过来说，“明道”即指重新确定封建纲常的神圣性，强化纲常道德的统治。

为了强化封建纲常在政治和思想上的统治，朱元璋策划和设计三部《大全》的编纂，其内容涉及上下几千年：“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也就是说，既对古代《五经》、《四书》等经书圣义阐发，也要有对宋代理学精义的解